

张廷竹



乙妹子

重 庆 出 版 社

B23702

二 妹 子

张廷竹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责任编辑：王从学
封面设计：詹蜀安

二 妹 子

张廷竹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1 插页：3 字数：217千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 100

书号：10114·243 定价：1.2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作者五个中篇。

这些作品，写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常人和常事。作者透过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敏锐的观察，努力开掘现实的表层，表现了一个个普通男女的命运，真实地传达出时代生活的风貌。

在表现手法上，作品不拘一格，既吸收了西方某些流派的技巧，又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精华，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张廷竹，男，祖籍湖南安乡，1950年出生于香港九龙，刚满月即由母亲携回大陆定居。由于家庭境遇坎坷，青少年时代生活十分艰辛。十四岁小学毕业即下乡插队，八载后招入杭州某造船厂做工，当过锻工、供销员、科长、厂长助理。1984年特招入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新闻干事。1985年春，曾赴中越边境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并荣立战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张廷竹从1980年12月发表作品以来，至今创作中篇小说十七部，短篇小说三十余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也间或为之。其中中篇小说《希望》、《五十四号墙门》等在报刊上展开过讨论，有较大反响。小说集《阿西们的笑》等已相继问世。

目 录

晨钟响起的时候	1
二妹子.....	97
写在一个女人背脊上的思想	148
树叶飘落在月台上	204
命运	270

晨钟响起的时候

我们已经从泥泞中走出来了，走进了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无论是上一代人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们存在着觉醒的差异而不是对立的矛盾——都在考虑着这个严峻的问题：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时代告诉我们，改革不是少数英雄的事业，它将使亿万人口都进入这个宏伟的历史画卷。这是一场革命。谁也不能回避。历史将强迫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作出回答。因为那明天的晨钟已经响了。……

——作者题记

A. 花港饭店

刘子建与韩军一起走进这家高级宾馆的时候，他真想问一声服务员有没有备用的拖鞋。可是他不敢开口，这位女服务员实在是长得太漂亮了一些。而且，很傲慢。他看见她坐

在服务台旁的侧影，令人心醉神迷的侧影——微微上翘的鼻子，与人赌气似的蹶起的嘴唇，这就更加突出了属于她那一类的、深知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女人的特征。他已经领教过大门口哨兵的厉害了。他盘问他们时间得那样详细，使刘子建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他是站在自己单位的保卫科长面前，而对方的办公桌上正摊开着他的档案。他踌躇不决地看了半天脚下被雨水和稀泥所玷污的球鞋，一直等到韩军已经若无其事般地坐到了客厅的沙发里去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踩到红地毯上面去，一面走一面还提心吊胆地向那女服务员偷偷地窥伺，随时准备听到一声嗓子尖锐的怒斥。还好，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杂志，——从她那翘起的兰花指头的缝隙间，刘子建知道这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中篇小说选刊》，里面有他的一篇近作。这一来他的勇气就陡然增添了好几倍，敢于坐到沙发上去。坐下去之后他一面悄悄地把双脚塞到茶几底下，一面带着苦笑想象自己是个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他接过韩军递过来的过滤嘴中华烟，划了三根火柴才把烟头儿点着。吐出第一口浓烟后，他感到自己的心跳频率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于是他就向韩军微微一笑，打量起这间陈设豪华的客厅来。

潘天寿、黄宾虹的山水画，沙孟海的书法，夹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之间。天花板上有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游戏的图案，落地式长窗前蒙着大红的法兰绒帷幔；威尼斯式的玻璃镜子，金色雕花的木器家具，这一切在透过帷幔照进来的有气无力的阳光辉映下，构成一种庄重的暖色。外面的

雨当然早已停了，在哨兵不厌其烦地盘问他们的当儿。

“看你这副忐忑不安的样子，倒好象罗老是我的亲戚。”韩军对他说道。

一缕苦笑出现在刘子建的唇际。若不是韩军拖着他“引见”罗老，他是绝对不会上这里来的。虽然，他也早已知道罗老到了杭州，在这里主持一个有关技术经济和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高级会议。与会者全是学者名流，全国各省分管这一摊子工作的领导干部。报上披露了这个消息之后，韩军就急煎煎地跑来找他了。他不得不“为哥儿们两肋插刀”，硬着头皮去找他的姐夫——罗老是他姐夫的哥哥。姐夫是一家无线电厂的厂长。一个错划改正的“老右”。他皱起了眉头，半天才答应打电话给他的哥哥，让他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待他们。并且再三关照小舅子要识相一点，少提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不象你，”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些，”他伸出手来指指客厅里的一切，“我觉得它们的价值简直是用天文数字来计算的，而我在三年前还是一个临时工，连任何一家最普通的青年工人的新房都不曾跨进去过的。”

“但是今天你成了鼎鼎大名的文坛新秀，完全有资格出席任何人的婚礼而不必准备礼物。”

韩军说着，也耸了耸肩膀。他知道刘子建说的是实话。然而他并不欣赏这一点。他觉得这些话酸味儿太浓。他善于揶揄人，这使他在很多场合中得到了力量。当他和一个人争

辩时，他很少占下风。朋友们对他说：“韩军，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虽然他不想当什么律师。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他究竟想当什么。作为一个刚毕业不久的老大学生，最近他对企业管理现代化很感兴趣。虽然他很清楚这辈子自己要当官儿是不大有指望了。

韩军确实是个“老大学生”。他刚过了卅五岁生日。当他坐在那里抽烟的时候，他那个黝黑的很宽阔的额头上出现了四、五条相当粗犷的皱纹。他也在望着法兰绒帷幔和那盏做工精致的镀克罗米的花型吊灯，刘子建的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细木镶嵌的橱柜，绒绣面子的沙发；房屋长长的，赭石色的正面和底层里装有铸铁栅栏的窗户。这是西子湖畔古老别墅宅邸中的一个，韩军对它们并不陌生。很多年以前，他记得自己的家也是带着这样庄重的暖色的。那是在北海公园旁边，北京城的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里。一家四口人住着六间房，还有一间浴室，房子又清洁又宽敞。韩军那时上高中一年级，还不大能看懂画，却一人住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大房间，房里挂着好几张著名书画家们送给他爸爸的墨宝。他从来也没有正儿八经地研究过它们，他自己的字写得象乌龟在沙滩上爬。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全然没有存在过。等韩军到了想研究研究它们的时候，那座房子已经几易其主了，那间挂着黎冰鸿和傅抱石的画的房间也早已属于别人。他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他从插队的沂蒙山区回北京探监——他爸爸作为“五·一六的舅舅”关在郊区一所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他将双手插在蓝色卡其布的裤子口袋里，呆

呆地站在旧居前，好象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理解。他仿佛不愿承认，他们已一无所有，连一张小纸片儿，一颗庭院里被人践踏过的小草也不属于他们了。他点燃了平生的第一根香烟，把它咬在蛇一样噬噬响的牙齿中间。一辆装着四只高音喇叭的吉普车驶过他身后的大街，他听见广播员声嘶力竭的叫喊，但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只有半个小时，你得准备一下。”刘子建对他说。

韩军叹了一口气。半个小时，亏他们说出口！假如我父亲还活着的话，要见您罗老会这样困难吗？托了几位“至爱亲朋”，勉勉强强地才“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接见一下”。这简直有点儿超级大国内阁首相接见请求经济援助的第三世界小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的味道了。而我们却是来和您“探讨一下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在学术上不应该排斥小人物的见解么，——向来说得冠冕堂皇。他闭上双眼。他开始考虑怎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考虑已久的“稀奇古怪的问题”一下子就端到这位德高望重的党内经济学家面前来。嗤之以鼻也罢，姑妄听之也罢，反正我有我的想法，总要说出来供你们大人物参考参考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四年大学，半年见习。他不知道该不该先向罗老提一下父亲。看来还是提一下的好。这会使谈话变得亲切一些。“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韩军把快烧到指头上的烟蒂捻灭在烟灰缸里。往事的景象又展现在他眼前。他又看到身穿灰色军服的父亲和他的战友穿过整个中国。当时罗老就是和父亲同一支野战军的，罗老是野战军后勤部部长，父亲是下面一

个纵队的司令员。这些勇敢的人为了把祖国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出生入死，将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父亲经常谈起在战争的空隙时与罗老夫子对弈下棋，探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问题。韩军相信这一点：罗老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而适当延长“接见时间”的。尽管那个时期已经久远了，但它永远也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他们只怕年轻人忘记了那些岁月。

他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罗老的秘书终于下楼来问了：“是刘子建同志和韩军同志吗？”

刘子建站起身来，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脑袋。“刘子建同志”，——此话中所有的涩味儿他都感觉到了。这就是一个穷小子和大人物攀亲戚的味道。在他熟悉的阶层里，那便是八杆子打不到的亲戚也互相称兄道弟，肩膀拍拍，头点点，七大姑八大姨地乱叫一气。可是在这里呢，你就变成了造船厂的二级锻工刘子建同志，门卫要将工作证反反复复地瞅上五分钟才打电话去问一声首长该不该放你进去。他感到面颊有些发烫，他不知道见到罗老时该称呼他什么才好。一九六〇年他在姐姐家里见过一次罗老，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是怎样称呼他的了，那时他才十岁，刚刚挂上红领巾。

他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韩军已经大大咧咧地走到头里去了。

套房的前厅里摆着一张长沙发和一对小沙发。茶几上有一盆珍贵的五针松。刚刚就坐，门轴轻微的响声又使他俩赶

紧站了起来。罗老终于出现在这一对年轻人的面前了。“大哥，”刘子建终于这样叫道。他是在站起来的这一瞬间想起廿多年前的这个称呼的。而且就他所能回想起来的是，罗老嘱咐他这样叫的。那时，正是全国笼罩着斗争气氛的时候，条条战线都在进行斗争：城市和农村、党内和共青团内、学校和家庭里、人的思想和心灵中……孩子们的社会生活几乎是那时成年人社会生活的翻版。他那时就知道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正和海峡对面的敌人内外勾结”，“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还从报上看到罗老的一系列“谬论”正在遭受来自小高炉前和田庄里的愤怒声讨，因此他不知该如何称呼这位享受部长待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才好。“叫大哥么，啊，”经济学家抚摸着孩子面黄肌瘦的小脑袋笑呵呵地说，于是他便这样叫了，叫得几乎象蚊子唱。

“坐，坐。认不出来了……不过，你长得很象你姐姐，所以我知道你就是子建。这一位叫韩军对吧，有何指教？”

看起来罗老确实是很忙，非常忙。他嗓音沙哑，手里还拿着一张公文，指缝里夹着一支变色铅笔。在那副深井一般的玻璃镜片后面，凸出来一双缺少睡眠的红肿的眼睛。他身边的窗子大开着，高级香烟的芳馨正缓缓地钻出去自由翱翔。可以看到远处白茫茫的湖面，太阳的光点在水中摇曳，一艘游艇正从三潭印月驶来，从那儿隐隐约约地传来阵阵音乐声，好象是从水面飘过来的一般。刘子建感到舌头粘在了上颚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可不是去参加什么文学青年的座谈会。在那种场合，他事先就知道人们的情绪会怎样，

会用什么话迎接他，他们将谈些什么。幼稚的牢骚怪话会领着他向一个不难想象的世界走去，那里一切都是见惯不惊的、熟悉的，不象此刻，韩军老兄给他带来了一种朦胧的惊恐感……不知道他要向罗老谈些什么，说不定这小子会信口雌黄，会惹得老头儿心肌梗塞……

“他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在铁路分局工作，见习期还未满，他有些问题想请教您。比方说，一条铁路线为什么不能穿过一座城市，——如果穿过的话对地方上将大有好处。可是铁路方面却不肯干，因为种种原因：设计上的不够细致，地方上想投资却遭到拒绝，管辖的权限……等等，他正在尝试用《资本论》中的关于资本纯粹流通过程中的一些原理，对如何加速社会主义资金周转，安排好生产、消费、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分析，他……”

“哦？坐下来，坐下来谈。”

刘子建的脸红了。他觉得自己的面颊、耳根，乃至脖颈都在发烧。很蠢，简直是蠢透了，他想。他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冷静有条不紊地把该说的话对罗老说清楚，将韩军和罗老的思路引入一条比较单纯的道路上去。只谈一个较具体的问题就可以了。时间是半个小时，他不希望超过，更不希望出什么洋相，浪费了老头儿的宝贵时光。然而他一开始就扮演了一个毛里毛糙的角色，居然站在屋子中间迫不及待地演讲起来，并且使用了一些自己根本是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的术语。他不知道罗老是否知道他在写小说，抑或在休息的时候随手拿起一本《小说月报》看看，在最后面的“报刊小说选目”

这一栏里看到过他的姓名。但愿不曾有过。否则就太糟糕了。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的小伙子。——他尴尬地坐回到小沙发上去时，用手摸了一下汗湿的前额。

“罗老，我曾经见过您……”韩军慢条斯理地说。

“哦？……”

“大约是五九年下半年的时候，您跑到京郊一个农场蹲点去了，父亲带着我一起去看您，给您带去一些吃的东西：罐头、香烟……您发起脾气来了，您骂我爸爸：‘干吗要坐着这样漂亮的轿车跑到这里来？老百姓马上要开始饿肚皮了！……’”

“你是老韩的儿子？……”

“是的。”

“怎么到杭州……”

“爸爸是‘五·一六的舅舅’，我当然是‘五·一六的表兄弟’罗……在农村插队了八年，七七年考上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我爱人是杭州人。”

罗老坐到在他们对面的长沙发上，他拿起茶几上烟盘里的一根香烟来，并没有问一声子建和韩军会不会抽，只顾自己点燃了。他似乎非常疲倦，憔悴的脸上显现出被无穷无尽的会议和问题搞得变成了灰褐色的老年斑。他的灰白色的眉毛在浓烟后面轻轻地、无力地抖动。他回想起了早已过世的韩军的父亲，想起了庐山会议上的一场风波。确实是骂过那个老头儿的，不止一次地骂过。尤其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经济

学家的预见之后，他跟这位在与中国老百姓生计休戚相关的国务院一家大部担任部长助理的同志更是吵个没完没了。——不跟他吵又跟谁去吵呢？他们是老战友，决不会捅到任何会议上去的，不会说罗老“人还在心不死”。实际上，他最欣赏老夫子的恐怕还正是这一点呢：人还在心不死！从星期六起，一直到星期天的晚上，两个老头儿不是去打野鸭、采蘑菇，就是去钓小鱼儿。在北方农村森林的窝棚里或是在干草垛中，部长助理同志把自己变成是罗老假设的论敌，用种种时髦的激烈的言辞与他辩论，直到罗老把它们彻底驳倒，驳得体无完肤。于是他们就躺下来回忆战争年代对今天生活的憧憬了。他们谈起百团大战，谈起打泰山和攻克孟良崮；谈到他们当初是怎样鼓励老根据地的乡亲们支援前方的。共产主义就在眼面前。“你们将驾驶着拖拉机和康拜因驰骋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他们跟刚刚参军的乡下佬儿许愿，憨厚的小伙子嘿嘿地笑了，“只要每顿饭能吃饱，而且吃的尽是白面馒头就行了呗。”——可是结果呢？罗老指着遥远的小山村大声责问部长助理同志。他们看到在贫瘠的土地上人们正懒洋洋地赶着瘦骨嶙峋的老牛犁地；在村庄上空的薄雾里，飘散着野菜煮熟以后酸涩的气味。韩军知道父亲每次跟罗老辩论后回家就吃不下饭，闷闷地抽烟，抱着脑袋。浓烈的烟气，从他的嘴里、鼻孔中，甚至好象还从两只耳朵里喷冒了出来。“你要好好念书，将来象罗老一样有知识和眼光！改造中国！”他这样跟儿子说，感慨万千。罗老当然知道这一点：部长助理曾经将罗老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概论让儿